

民初兴教风潮与宁波观宗研究社的开办

◎何建明

在近代影响甚大的观宗弘法研究社，是观宗弘法社与观宗研究社合并后的称呼，其前身，或最早的形态，实是民国初期成立的观宗研究社。而观宗研究社的成立，也不象后人所说的那样是谛闲一开始接掌观堂时就拟定好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影响而成的：一、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就强烈地感受到只有振兴佛学、培养佛教人才，才能振兴中国佛教，因此，从太虚等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到寄禅组织中国佛教总会，特别是寄禅以身殉教后，以中国佛教总会为代表的全国佛教界，大都具有开展佛学研究、培养佛学人才为当务之亟的历史自觉；二、早在谛闲接掌观堂之前几个月，他就在中国佛教总会筹备成立的总部所在地，即上海的留云寺，与上海的诸名宿一起发起成立佛学研究社，要求以发动和推动佛学研究来振兴中国佛教事业；三、在谛闲接掌观堂之初，大力支持他的式海、静安和太虚等人就在谛闲接手观堂后在该处开展佛教弘誓会工作，并积极推动佛学研究社等事宜。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也宣告了宗教必须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的新趋势。各宗教于是纷纭成立自己的教团组织，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佛教界也在民初相继成立了以太虚和仁山等为代表的佛教协进会、以谢无量为代表的佛教大同会、以欧阳渐和李邱希明等为代表的佛教会，等等，他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研究佛学，培养佛学人才，以振兴中国佛教文化事业。尤其是太虚、仁山等人在南京毗卢寺筹备，后来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大会的佛教协进会，明确向僧界提出了寺院学院化的口号，一度酿成了新旧两派寺僧的激烈冲突，造成了震惊教内外的“金山事件”。

也正是“金山事件”使广大僧界认识到，研究佛学、培养现代佛教人才是佛教发展的当务之亟。因此，当寄禅领导成立中华佛教总会时，就明确地将研究佛学和兴办僧教育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重要目标。虽然因北上护教而以身殉教，使清末就积极推动僧教育事业的寄禅过早地离世，但是，他的后继者在草拟和颁布《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时，就十分明确地要求“本会先从教育入手，振兴佛教”作为目标，并在所要开展的“事业”中，规定“昌明佛学”。为此，该章程还明确地指出，本会为策进宏法利生事业而兴复各宗专科学校；就小乘而言，应创办俱舍宗大学（毗昙有门，佛法根本，世亲一论，当时无不竞学，号为聪明论，自中国始成一大专门学，标立宗名）、成实宗大学（具明二空，其义优长，齐梁之间，江南尤盛）；就大小乘而言，要创办律宗大学（佛住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故设随方毗尼，轨范僧徒，以起人天皈



敬);就大乘而言,要创办禅宗大学(此宗为中国特创,分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五家,多行于高等社会,以净妄凝念穷明心源为则,非大彻悟者,毋托空言,不立文字)、法相宗大学(依唯识等论立宗,以五位百法摄一切教门,诚末法救世之良药)、三论宗大学(以八不中道为要,义以无有所得为究竟,即龙树空宗,实中国兴大乘之第一变)、真言宗大学(如西藏崇尚喇嘛之密乘,所述妙要,为三密相应,即身成佛)、净土宗大学(念佛为简易法门,善导大师在世之时屠肆殆无过问者,其感化力已可想见,此宗依三经一论,属弥陀教);就一乘而言,要创办天台宗大学(明圆顿之妙旨,立三止三观六即十乘等法,有山家山外二流)、华严宗大学(此宗入理之妙,说十玄六相,以法界为缘起,包含一乘圆顿,微妙最极之义)。与此同时,还要分设中学小学师范各种学校及诸乘研究社讲演传习所,以普及佛教文化教育。^[1]

当时太虚因病未能参加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的草拟与颁布,特别给中华佛教总会去信,强调“昌明佛学、振兴教育”的极端重要性,需要各寺院努力落实,而不要成为一句空话。他说:“昌明佛学条:兴复各宗专科大学,列表甚美。然此系佛教之根本,事业之首要,应实力建设,庶不虚泛。窃谓宜即以现有各丛林寺庵,分别调查,择宜开设。但改变其规则法度,俾讲习修持,各由一门深入;因利而导,不难坐收事半功倍之益也。”^[2]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民初的全国佛教界兴起了一个研究佛学、兴办僧教育的热潮,各地纷纷成立不同形式的佛学研究组织,推动佛学的研究、传播和佛学人才的培养。

湖南省佛教界在长沙上林寺成立湖南佛学会,后改名为湖南佛学会,由著名佛教士绅吴雁舟、夏同龢等发起组织,并专门聘请曾在清末金陵刻经处从杨仁山学佛的江浙佛教界新秀惠敏法师来湘主持其事。吴雁舟在成立会上发表《佛学与民国之关系》的演讲,陈述成立佛学会的原因在于:“今日世界各



谛闲法师德相

未有废绝宗教者,惟大抵主张政教分离,政教既分,则政治不受宗教之妨碍,而宗教愈能发达,国民道德藉以增高,佛学流传我国最古,他国且有研究昌明者,我国尤不能不加意提倡。”决定佛学会会务分:讲演部和流通部,演讲分内部与外部两种,内部又分三项进行。讲演部第一项就是分宗派,请专门研究某家者担任某讲席,如吴雁舟研究相宗四十余年,惠敏研究华严宗多年,可分别担任相关各宗的主讲。第二项即分经法,先演讲卷数少的,再依次演讲卷数多的,乃至全部大藏。第三项分题法,即提出哲理上种种问题为近世欧美各哲学所未能解决的,证以佛祖学说,如宇宙论、灵魂论等。外部演讲,即在各处设讲演场所,使一般社会解悟佛法,而演讲所得的收入,可以用来编辑佛学会杂志及图书普及。流通部:应将湖南省已刊的经典搜罗度藏于一处,更与江浙等处所刊经典互相交换,再创设图书馆,备各种经典,以供人观览。^[3]

而当时因拥有阿育王寺、天童寺、七塔寺和观宗寺等著名丛林道场而素有东南佛教集中地之称的宁波的佛教界,在推动佛学研究、培养佛教人才方面也没有落在其他地区的后头。如宁波西河沿观音寺就成立了佛教青年学会,冀望通过讲演、印送传单小册子、发行杂志书报,讲求大乘行愿,养成自治能力,启发爱

国爱教^[4]。还有发起成立佛学研究会,“以发挥大乘佛学为宗旨,凡会员皆担负阐扬法化全权责任,以课艺演说为入手,发行书报为进行,推及全球为目的。”^[5]

当然,谛闲在上海留云寺发起成立佛学研究社和式海等在宁波平湖筹备成立佛教弘誓会,都是属于民初全国佛教界掀起研究佛学、兴办佛教教育之潮流的一部分。

二

谛闲正式接住宁波的观堂是在1913年的年初。据说他在同意接任观堂住持时,主要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将“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二是在观宗讲寺设立研究社。对于前者,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史料都可以得到证明。至于后者,则有一些疑点。比如1920年曾赴观宗寺亲近谛闲长老并学习天台教观,后曾任观宗寺佛学院院长和1949年开始长期担任天台国清寺住持的澹云就认为:“谛闲法师于民国二年将观堂改为观宗,其中所设立之佛学研究社,乃系式老(即式海)创办,谛公依之发展而已。”^[6]从记述谛闲主持观宗寺的现有材料看,观宗寺佛学研究社似乎并不是谛闲最先提出来的。而提及观宗寺佛学研究社,不得不先提到式海、太虚等人在观宗寺积极举办的佛教弘誓会的活动。

太虚是谛闲接任观堂而改名观宗讲寺后,受式海等人的邀请来观宗寺筹划佛教弘誓会事务的。《太虚自传》中也明确地提到:

清末民初间,宁波的延庆观堂,是僧众中最恶劣的马流僧巢穴。民元冬,观堂以寺僧的腐败不良,被地方官厅封闭,所有的僧众尽皆驱逐离寺,令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部另选妥僧住持。时主持鄞县分部的是七塔寺岐昌和尚——即水月法师,被推举为住持的,有心恺、谛闲等四人,心恺等皆辞绝不来,而谛闲法师亦逡巡未敢接任。时式海法师在平湖报恩寺,领导着佛教弘誓会的桂明、志恒、英修、静安等一班人,闻观堂事,深以可据为弘誓会会众道场;

静安等走叩谛闲于上海,极力怂恿他去担任方丈的名义,关于实际、则不论财力上、人力上,概由会众负责,以免谛闲法师的顾虑。谛闲因此乃于民二的正月接任观堂住持,式海、静安等以从前被逐的马流僧常来骚扰,乃请曾率僧军的玉皇坐镇客堂,又邀我为计划弘誓会的一切进行事宜,我因与谛闲法师及式海、静安、玉皇等在观堂同住了一个多月,为撰定佛教弘誓会的缘起及章程,而我与玉皇的友谊亦从此深缔。不久,观堂改称观宗寺,基础稳固,谛闲法师的法徒等,不愿有弘誓会全权独揽的支配其中,与式海、静安、桂明等势不相容。旋式海等相让退出,我则已先离去,而玉皇未几亦因与谛闲法师大起冲突,脱离观宗寺来依我住,我时住在茆老所住持的宁波西河沿观音寺。

在上述《自传》中,太虚还特别提到:“除在观宗寺月余,及在佛教总会四五个月之外,从民国元年的春天到民国三年的夏天,这两个半年头中,我似不曾做过关于佛教的其它事业。”这也就是说,民初太虚在观宗寺进行的佛教弘誓会之工作,虽然时间短暂,意义却非同小可。为什么这么说呢?

佛教弘誓会虽然是由式海、静安等人先在宁波平湖发起,但真正成立并造成社会影响,还是太虚受邀请到观宗寺之后。太虚在观宗寺负责起草了佛教弘誓会的章程等文件,并在成立后的佛教弘誓会多次发表演讲。他早在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就与仁山等在南京和镇江金山寺筹备成立佛教协进会,积极主张革新佛教,提倡佛学新式教育,推动寺院学院化运动。后来,他又协助寄禅开展中华佛教总会的工作,并主编中华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这也就是说,太虚是当时佛教界的知识先进。因此,他受聘来观宗寺开展佛教弘誓会工作,实际上成为佛教弘誓会思想的中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他起草的《佛教弘誓会简章》中不难看出。

佛教宏誓会被规定为“佛教中之特别团体”。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其“以四宏誓愿为宗旨”,即:一、

众生无边誓愿度；二、烦恼无尽誓愿断；三、法门无量誓愿学；四、佛道无上誓愿成。确定该会的事业，主要有利人、兼利、自利三种。利人的事业，就是“以众生无边誓愿度故，当组织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方便设化，利益有情”。兼利的事业，一是“以无上佛道誓愿成故，当修习止观，改组教团，俾自他平等皆成解脱”。二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故，当组织研究社、讲习所，研习世出世间一切学问，互相策励，与诸有情共臻上乘”。至于自利的事业，即“以烦恼无尽誓愿断故，当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念念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会员入会上，分个人入会、寺院入会两种。个人入会，是指“不论僧俗，不拘国籍，凡信仰佛教，热心佛学，能设立普通、特别誓愿，遵守本会章程者，得会员一人介绍，皆得填写愿书入会，领取本会会证”。寺院入会，分二种性质，一种是“由住持者自愿将所住持寺院，加入本会，每年酌量纳费者，本会当负保护之责”；二种是“凡寺院完全加入本会者，由本会派人住持，即为本会所公有，皆由本会调处，不得复以私人资格占为己有”。加入的会员，“有受本会保护之权利”，“有受本会教育之权利”，“有选举本会职员之权利”，“有被选举为本会职员之权利”，以及“有被公推为本会寺院住持之权利”。但同时，入会的会员也有其义务，即维持本会经济、信从本会宗旨、遵守本会规约、扩张本会势力、进行本会事业等义务。该简章还规定了会员规约，不仅要求会员之间当互相警策、互相亲爱、遵佛教诫、同心协力，还应当广行慈善。^[7]

式海、太虚等在观宗寺开展佛教弘誓会的工作，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实际上是有一些成绩的，这可以从太虚曾在佛教弘誓会发表过精彩的讲演来印证。太虚的演讲时间，正是谛闲接手观堂之初、式海等在观堂大力开展佛教弘誓会工作之时，讲题是《抉伪披真》，面对的是莅临的全体佛教弘誓会会员。太虚在演讲中针对“人智益开，人伪弥甚”之时势，大声疾呼道德重建，反对执著于佛语而自相束缚。在演讲最后，他还高度评

价佛教弘誓会的目标和工作，他说：

观堂创于四明尊者，道香德馨，被于天下。顾降及近世，几成秽藪，流风余韵，湮灭无存！今得佛教伟人谛公来为住持，劈头以改观堂为观宗讲寺，以树作新之基，入泥犁而庄严，现净土于弹指，躬逢其盛，曷胜欣羨！而式海、智恒、桂明、玉皇诸师，复有宏誓研究会之设，与太虚夙昔心期，尤为吻合，不自知其言之累累，喜可知矣。^[8]

太虚的这段话与其上面所引《太虚自传》对佛教弘誓会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说明他之所以接受来观堂参与佛教弘誓会事宜，是与他当时的佛教革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在观宗寺给佛教弘誓会会员的这次演讲中，还提到：“太虚末学，何足以语道！且未尝习知俗世之礼法，获受圣贤之教化，故出言吐语，大都不经，僻行怪状，不理众口。然随宜示现，不存轨则，如鸟飞空，并无足迹，可无论也。即就事相以论之，发留一寸，本出佛制；服随国俗，自古已然，彼印度之比丘，固未始穿袍着裤、似吾国俗人今所目为和尚者也。虽然，太虚于是，无可不可，苟有机缘凑泊，则随感而应，尚可由圆顶方袍者现为非圆顶方袍者，况由非圆顶方袍者复为圆顶方袍乎！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习俗，彼以太虚为奇怪者，彼亦自奇怪之耳！太虚自抚之良心，奇怪二字，殊未敢承认也。夫随喜赞叹，因利而导，广运方便，不主故常，此入世利生之宏范也。”这段讲话正表明太虚及佛教弘誓会的工作，带有很强的革新性、甚至是颠覆性。而他们如此在谛闲所掌管的观堂大力开展革新活动，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势。而这或许就是谛闲要将他们赶出观宗寺的主要原因。

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从以上佛教弘誓会简章中所要开展的利人和兼利的事业中不难看出，太虚、式海等人所主张的组织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方便设化、利益有情的利人事业，实际上是后来观宗寺弘法社的主要目标，而所主张的组织研究社、讲习所等，正是后来研究社和佛学舍的重要源头，正如上文所引《宁波通信》中所说“谛师欲开办佛学研究社于寺中，教

育僧徒为将来布教之备”。

不过,谛闲在来宁波观宗寺开办佛学研究社之前,曾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在上海的留云寺,与上海诸名宿一起创办佛学社,并先后主讲了《圆觉经》、《百法明门论》及《相宗八要》等佛学要典,继而编写了《八识规矩颂讲义》。其中“开列八识心所多寡之不同,造业善恶强弱之不一,分别皎然,尤于三量三境三性三受,条分缕释,详而不紊,加以天台教义,阶位历然”。^[9]

值得重视的是,在1912年上海留云寺开办佛学研究社时,谛闲还亲自撰写了《佛学研究社征集同志启》。他有感于“由汉至唐,历宋元明,历代崇奉,缁素信仰,究心彻悟者,指不胜数。迨于今日,习久弊生,不解随文习观,但知数墨循行,一味向外驰求,迷背西来教旨,不知出家为了生死事、诵经为出尘劳法。唐丧光阴,虚消岁月,岂我佛教之本旨哉!兴言及此,宁不痛心?”他认为,中国佛教之所以造成晚近的衰颓之困境,“实为失于教育,迷于本真,汨没爱河,不能返本追源耳”。他说:

今者浅识之人,以佛教为迷信。殊不知所知烦恼,二障俱空,善恶是非,等归无念。未尝欣天宫而憎地狱,并不离生死,而求涅槃,证见一心,破除业惑,此正解脱迷信之实谈,岂与一神多神诸教相提并论哉?缘以我等僧徒,不知密意了义之有殊,不究心佛众生之非异。问以经义若哑羊,宁不愧乎?此何以故?诚以不学之咎也。在昔隋唐盛世,讲肆□于天下。宋明以来,渐以衰少。愚僧薄植,日益贡高,以马鸣离名言相借口,以六祖不识一字自矜,不知穿衣吃饭,尚须学习而能,况佛学最深之理,自非大士现身,孰能自然领悟哉?迨者泰西各国,哲理之学,精思所至,亦多上攀唯识,近附华严。足知真俗二谛,无所不周。故谈者卒莫能出乎其外。然则白衣高士,尚契玄言,况我同流,可无努力?若非研究至理,从事闻熏,使数千年之宗教,任彼湮没,伊谁之咎欤?用此大惧,爰集同人,倡佛学研究社于沪上,以留云为立足之基础,乃设总机关于上海,以便交通。当兹

民国初造,百废俱兴,佛教自宜广布,爰发大心,征求同志,专意研究大乘经论。凡愿入社者,不分缁素,信仰自由,各出愿书,注明于册。一切办法另订章程。有志佛学者,幸勿忽焉。

以上这段话可以反映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谛闲当初之所以没有接受来宁波主持观堂,无疑是在弘法条件上,观堂是远不及上海留云寺的;二是,组织佛学研究社,不是谛闲一年后来宁波观宗寺受式海、太虚等办理佛教弘誓会的影响所致,而是他在得知被遴选观堂主持前就已经有的规划。这个规划之发生,从其清末在各地弘法和在南京参与主持祇洹精舍及江苏僧立师范学校等事务中就不难想见。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见,也正是谛闲早有组织佛学研究社的设想,才有可能在静安代表式海等人来上海说服谛闲来宁波接受住持观堂,并答应将佛教弘誓会设在观宗寺内。因此,《佛学研究社征集同志启》也可以看作是谛闲来宁波主持观宗寺后开设佛学研究机构的指导思想。

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在太虚、式海等人筹备成立的佛教弘誓会撤离观宗寺后,谛闲在观宗寺所积极筹划的,似乎并不象后人所说的观宗佛学研究社,而是另一个名称的机构,即法华学堂。

据《佛学丛报》中《四明观宗寺法华学堂简章》所载,该学堂是“以堂绍隆佛教,正依法华大经,演扬三乘,会归一乘,以阐教修观、融通三谛、自度度人、翊赞共和为宗旨”,并规定之所以称之为“法华学堂”,就是因为“本堂天台法派,以法华全经,管摄三藏,教观并重,普利群生,故定名法华学堂”。该简章还对法华学堂的课程设置、经费和生员资格、管理和教授等有明确的规定:

就课程而言,法华学堂学生分正、附两科,课程也相应地分为两级,即正科大乘,附科小乘,大小分习,如同印度时佛教派分的旧例。至于正科课程,

《四明观宗寺法华学堂简章》规定“依大乘教行理三经,列为三门,阐教,教也。修观,理也。助行,行也。三行圆具,于佛一期大法,思过半矣。”

其中的“阐教门”,则规定“佛无二道,教有多门,本宗所依,以山家诸要部为主,余著作为兼习,然虽有正有兼,其经义仍复通贯,而归本于演畅一乘,圆修三德,以巩固弘法利生之基础。”其讲演之法,仍依三藏列为三科。1、讲经读经,包括主课需要的法华经、金光明经、维摩经、无量义经、大般涅槃经等和兼习需要的华严经、圆觉经、般若经、六度集经、解深密经、楞伽经、楞严经、毗卢遮那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规定“经贵读诵,圣训昭垂,古人于讲经之前,多先读白文以领其旨趣,今特于讲经之前,加入读经半点钟,以为常课”。2、讲律,其中主课则是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兼习则是菩萨善戒经等。3、讲论,其中主课是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天亲法华论、涅槃论、涅槃本有今无论,兼习则是大乘起信论、八识规矩、百法明门、唯识论、入大乘论、十地论、往生论、觉意三昧、无诤法门、安乐行义、四教义、六即义、观心论、法华本迹十不二门等。规定“以上三藏要典,略开数部,此外诸应旁治之书,可随时参阅”。

“修观门”,就是止观门,因“有教无观,如有灯无火,本宗教观双运,故于讲习之后,特立此止观一门”。此门包括观相和观法。观相是“依诸法实相观、法华三昧观、无量寿佛观等行相,随机对治三毒等病,以为修习”。观法是“参看四念处,摩诃止观,五门禅经,禅法要解等书”。“助行门”,是因“有教有观而无行,如有灯有火而无照用。本堂特立助行八门,随人抉择修持,以为进趣六度万行之助”。

助行门包括:写经、诵戒、礼忏、念佛、阐明教理、劝导人民、度幽和放生八种。就写经而言,“《普贤行愿品》中,极赞写经功德,本堂立此写经一门,列为日课,既可藉书写经典以广流通,亦可因书写而定其意”。诵戒则是指,《梵网经》,十重四十八轻戒,为大乘正行,每半月轮派一人于众前高声读诵,以当警策。礼忏是每月终之

日,集众礼“法华三昧忏仪”一堂,以为精进之助。念佛是每夜临睡时,各念“无量寿佛”名号千声,以增清净之意趣。阐明教理是指,每星期中,由教师于经律论中发问题一条,各作答一篇,发明义蕴,惟篇幅不拘长短,文句以清顺为贵。

而劝导人民是指,欲回薄俗,端资化导,大乘学者,自未能度,不忘度人。本堂特开此门,撷取贤愚因缘经、杂宝藏经、百缘经、正法念处经、业报差别经、十八泥犁经、罪福报应经等要义,详陈十善十恶之果报。每七日中,轮派一人,于寺前登台演说,以回末俗。

儒云: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佛门有度幽之举,正所以拔幽滞而安人道之所设,于每夜依古法行之。而现今“末世杀机日多,由众生好杀心强故。我佛倡大慈平等之教,凡属佛徒,均宜恪守,引六道轮转,莫非夙亲。故戒杀放生,尤为要义。但限时日,力到便行。庶勿忘智祖凿池放生之美云。”

以上这八门,前四门属自度,后四门属度他。由此涓埃之微行,以为八万四千行门之起点。

除了正科课程,还有附科课程。《四明观宗寺法华学堂简章》指出,附科课程相当于“小乘程度,亦依前例,列为三门,竺师旧传,小乘学人,资格不深者,不得滥听大乘深法,故此科均依小乘,立为附课”。也分阐教门、修观门和助行门三门:

阐教门,也分三科:1、讲经。听讲阿含部起世因本经、佛本行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法句、譬喻经等,以启其正信。2、讲律。听讲沙弥律仪、四分戒本、楞伽经断食肉品、瑜伽声闻地论等,以策励五行。3、讲论。听讲四谛论、十二因缘论及百喻经等,令知生灭因果果报之原理;其成实论、俱舍论、诸阿毗昙论等,如有利根之士,能专功研究者,亦听其便。

修观门,即“修五停心等观,观于诸相,以息纷妄而发正定,是为无生三观等门之起本也”。

而助行门,则分八科:读经。读法句经、遗教经、四十二章经等,以熟为度。写经。写地藏本愿经等,令知善恶因应之不爽。诵戒。每半月半月诵沙弥戒、四分戒本



宁波观宗寺大雄宝殿

等。至于礼忏、念佛、阐教、度幽、放生等,其要求则与正科相同。

就经费而言,“本堂经费,向无着款,一切费用,或为常住节出,或为私家慨助,或系从公拨给,惟现计所入之款,为数无多,不得不量入为出。除力所能及者外,所有经费,仍由学者自备”。具体来讲,学费本堂助给、膳费本堂助给、住宿费本堂助给、书纸笔墨费学生自备、衣单杂费学生自备、医药费学生自备。

至于学生入学的资格,则按两班之不同而要求不同。甲、正科学生资格:1、具大乘戒,志宏愿切,行履真实者。2、通达文义,谙习禅教者。3、不拘远近,平等教授。4、无论何宗,不分畛域。乙、附科学生资格:1、具沙弥戒四分等,言行柔和,威仪整肃者。2、稍通文义,堪习教观者。3、不拘远近,平等教授。4、无论何宗,不分畛域。入学年龄也因不同班而有不同的规定:1、正科学生,规定年在二十五以上者,为合格。2、附科学生,规定年十五以上至三十岁,为合格。至于招收额数,本堂学生,正科三十名,附科五十名,其有尼众或在家男女走听者,仍附设座席,俾为旁听。入学时还需要介绍,本堂学生除由寺内常住选入外,其余概由本城内外各寺住持,为之介绍,经本堂认可之后,准其入学。

简章还就“法华学堂”的管理及教授事宜作了规定:本堂管理师及教授诸师,皆聘请热心卫道及观行相应之人,以为良导,其人数及职务是:1、堂长一人,主持

全堂事宜。2、监院一人,总理全堂各务。3、监学一人,监视学生出入,巡查全堂。4、干事一人,干理全堂杂务。5、书记一人,任堂内一切缮写。6、讲经师一人,讲演诸经。7、讲律师一人,讲说戒律。8、讲论师一人,演扬论义。9、副讲经师一人,助讲经师讲演。10、知客一人(监学兼任),接待来宾。

简章还对学期和休假作出

明确规定,即三年为一修业年期,每半年为一学期。休假期则依世界各学堂通例,立有五种假期:1、常假每七日放假。上半日休沐,下半日仍上堂书写经文两点钟,写毕休息。2、期假每一学期满,放寒暑假四十日。此四十日内,诸教师各有行动,学生仍当自行研究,以防退迨(另有寒暑假期内研究章程)3、特假四月初八佛诞日,放假一天,虔修供养。十月二十四日智者大师忌日,同前。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同前。此外,如阿弥陀佛、观音、诸圣诞日假期均临时牌示,兹不具列。4、事假。业精于勤,荒于嬉。凡学生常期修业不得外出,如有特别事务出外,须由学长据实呈明请假若干时,注册为记,事毕回堂销假。5、病假。学生有寒热失调者,由学长报明请假。入病堂调治,病愈销假。病重愿出堂医治者,亦得由介绍人领出调治。

另外,《法华学堂简章》还就考试、奖罚、升晋及毕业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学堂课程严密,有三种考试,即常考每月终举行;期考每学期终举行;大考三年期满后举行。学堂为绍明大法,集众讲习,诚虑人多不齐,故立有各种规则,以归一致。凡属学徒,理宜遵守,如学行精勤者,由教师纪功加录分数;有过者扣除,至考试日,总结分数多寡,以验功夫之进退,决定奖罚之例如下:1、奖励,有语言奖励和分数奖励。2、罚例,有语言惩罚和扣分惩罚。至于升晋,学堂规定附科学生,本习小乘,倘有发大乘心者,如果志愿恳切,言行相应,亦许升入

正科,预习大乘教义,以副如来接引小乘进趣大乘之意。学堂讲习,分三年授业,至第三年期满,依世界学堂通例,作为毕业,考试合格者发给文凭,弘法十方,上报佛恩,下资群有;其不及格者,仍令补习半年,期满,再试合格,补给文凭如前,以资激励。在最后的第十七章是附则,规定以上本堂简章十六则,凡在堂之人,都应当按章实行,倘有应当临时修改之处,届时再议。^[10]

从这个法华学堂的《简章》来看,说是“简章”,其实已经是非常详细的章程了。可惜的是,反映观宗研究社和法华学堂开展实际活动的情况记载非常少见。当代学者方祖猷先生说:“倅虚法师《影尘回忆录》第七章《观宗寺佛学时代》说:‘谛老复兴观宗寺之后,因为立不起学堂,才立一个研究社。’说明研究社并不向外招生,其所面向为寺内僧人,且规模不大。当时共分甲、乙、丙三班,人数共三十全人,仅有主讲与辅讲两职。”^[11]这里提到观宗研究社不对外招生,而只是面对寺内僧人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

1913年谛闲接掌观宗寺后,跟随他的有仁山、静权、静修、根慧、志恒等人,成为协助谛闲振兴观宗寺的主要力量,并先后担任住持、监院等要职。志恒原是与式海一起来观宗寺举办佛教弘誓会的,佛教弘誓会散后就留在观宗寺,一面听谛闲讲经,一面帮助谛闲复兴观宗寺,在观宗寺前后十八年,曾担任过观宗寺住持职,正如一位知晓他的居士所说:“余尝因事宿寺中,阖寺僧众,于五更早起礼佛,则见高坐者志恒也,跪拜持诵,一如僧众,且加功焉;僧众会食于讲堂,例无兼味,则见高坐者志恒也,蔬菜粝饭,一如僧众,且加餐焉。檀越有故违杀戒者,志恒必严拒之,婉劝之,务使听从而后已,虽严词厉色弗怒也,势家豪族弗顾也。予乃恍然于观宗寺之所以兴,而谛闲上人之所以享盛名欤,是可以觐志恒矣。”^[12]从这里可以看出,谛闲在接掌观宗寺之初期,对于培养僧才还是下了相当功

夫的。

况且,谛闲初接掌观堂,百废待兴,经过多方努力,先后募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堂、禅堂、藏经阁,从而使观宗寺在规模上“蔚为东南名刹”^[13]。因此不难想见,因主要精力放在兴建殿堂上,谛闲主持观宗寺之初期,虽想在培养僧才上有所成就,但毕竟财力、物力和人力都不足,培养僧众的工作只能委托他人,有时效果并不好。因为毕竟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经历和讲演才能,所以经常会有学生借故中途离开。《四明观宗寺法华学堂简章》也只是他振兴天台专宗教育事业的一个基本设想。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1917年入学观宗研究社的倅虚法师对当年就学于观宗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观宗研究社办学的一些情况。

首先,观宗研究社招收的学员,并不只限于寺内僧人,而是面向整个佛教界。在观宗学舍开办的前后,社会上确实有人批评谛闲在观宗寺开办的研究社只是培养自己的生徒。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从外地进入观宗寺学习的倅虚以亲身闻见而说明并非如此。他说:“有人在外面散布传单攻击谛老,说观宗寺原先住十方人,现在改成子孙庙,还有捏造的一些别的言词。其实并无其事,完全是外边的人造谣言侮辱他。因为那时我正在观宗寺住,目睹事实,他们外面所说的那些话,都是没有的事。”^[14]

倅虚这么说,最主要的根据是,1917年观宗寺为纪念谛闲六十寿辰,举办了一次谛闲传戒活动,从9月15日到10月15日,四众受戒弟子合计有一百二十五位,其中的一些从外地来受戒的僧众,就因此留在观宗寺,入观宗研究社学习,倅虚就是其中之一。而另一位名僧,来自于辽阳金银库的净玉,也在与倅虚一起受戒后,入观宗研究社学习。当时入观宗研究社学习,还有些非因来观宗寺受戒而慕名前来的,如从普陀山受戒后入观宗研究社的妙真、从常州天宁寺习禅后来观宗寺的常惺,等等。

其次,观宗研究社实行主讲和辅讲制。谛闲作为

主讲,因主要忙于观宗寺殿堂的建设工作而很少讲课,实际的课程讲授由辅讲法师完成。而辅讲法师通常只有一位,当时就是静修法师任辅讲。因此,倓虚说:“研究社的主讲是谛闲老法师,开大座讲经的时候,也应当由谛老讲;但是因为观宗寺由谛老复兴,事情多,每天忙于应酬,有时候对大座经无暇来讲,就委托当辅讲的,静修法师讲四教仪集注。”谛闲也只有在辅讲不在或空缺的时候,履行主讲的职责,为研究社学生讲经。但是,“谛老因为在观宗寺事情忙,应酬多,已经快半年没讲经,也不知学生的程度如何。因为事情的忙碌,所以讲经的时候,很简略,都是讲完了之后,叫学生自己去用功悟解,到第二天再回讲。”^[15]

第三,观宗研究社实行学修一体的寺院化严格管理制度。据倓虚回忆说,那时候,研究社分甲乙丙三个班,有的学生已经在那里住过好几年了。他因才去不到一个多月,就列在丙班里。观宗寺的课程,每天早上三点起床,三点半上大殿,每次上殿不少于两小时,念快了谛老不乐意。到五点半下殿,稍微休息一会,就过早斋堂。下过早斋堂,稍休息一会儿,各人自己看经,预备对前一天课程的回讲。八点钟回讲,实行抽签制,依抽签号顺序,一个一个地回讲,直到十一点下课。稍加休息,就于十一点半就过午斋堂。下了午斋堂要绕佛,因为观宗寺住一百多人,绕佛的时间也比较长。绕佛下来之后,是休息时间,可以看看经,或睡一会觉。到一点钟,听报钟一响,大众都持经本到讲堂。等大众到齐之后,谛老进堂,先说几句开示的话,然后敲三下木鱼止静,大众修一个钟头的止观。开静之后,稍加休息,就是听大座讲经。到下午四点钟,听完大座之后,稍微休息喘口气,就上晚殿。这个晚殿,也要两个钟头。观宗寺是教下门庭,不讲持午,每天三顿饭。下晚殿,休息片刻就吃晚饭。晚间,七至九点,这两个钟头,是自修的工夫。个人在寮房里看经,三个人一个屋,一张桌,一个油灯,点一根灯心草,两根都不许可。九点钟开大静,下过二板之后,一律息灯。各寮房由纠察师负责监视,二板后,各寮房不许再有灯火。到明天三点

钟起床,共睡六个钟头的觉。这样计算起来,一天之中,上下课,加上殿过堂,要有十几个钟点,大家没有一点闲空。

第四,谛闲对观宗研究社的学生非常关照和爱护。据倓虚回忆,在静修当辅讲的时候,有位学僧与静修不睦,两人经常发生口角,静修因此落下狠话,要迁他的单,并多次向谛闲反映这位学僧的情况。谛闲不仅不同意给这位学僧迁单,还劝导这位学僧好好学习,并要求静修要能够原谅学僧的一些过错,不能动不动就迁他们的单。谛闲宁可在万忙中亲自给学僧们上课,也不能允许要学僧迁单。最后,不是这位学僧被迁单了,而是静修自己离开了观宗研究社。不仅如此,谛闲对各地来的学僧都有相当的了解,当时倓虚和静玉来自于东北,出于对北方佛教发展的迫切需要,他就特别关心他们两个,希望他们学成后能够回东北和北方大弘佛法。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谛闲办僧教育,完完全全是从学僧的利益和整个佛教事业出发的。从观宗研究社、到观宗学舍,再到观宗弘法学社,观宗寺之所以能够在僧才培养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这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注 释】

[1]《中华佛教总会章程》载《佛教月报》第一期(1913年4月),《章程》第1-19页。

[2]太虚《上佛教总会全国支分部联合会意见书》(1913年3月作)载《佛教月报》第一期,《意见书》第1-6页。

[3]《湖南佛学会开会详志》载《佛教月报》第一期(1913年4月),《纪事》第1-3页。

[4]《佛教青年学会发趣文》、《佛教青年学会简章》载《佛教月报》第一期,《章程》第19-21页。

[5]《佛学研究会序言及简章》载《佛教月报》第一期,《章程》第21-24页。

[6]澹云《式海老人别传》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九期(1935年9月),第135-141页。

[7]《佛教宏誓会简章》(民国二年春在延庆观宗寺作),《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51-454页。台北善导寺版。

[8]《挟伪披真——二年正月在延庆观堂宏誓研究会讲》载《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八编《讲演》。

[9]逸山辑录、宝静编述《谛公老法师年谱》。

[10]《四明观宗寺法华学堂简章》载《佛学丛报》第十一期(1914年5月1日),《专件》第1-11页。

[11]方祖猷《天台宗观宗讲寺志》第14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12]毛莽圃《送志恒上人归伏山序》载《弘法社刊》第二期,第19页。

[13]蒋维乔《谛闲老法师传》载《弘法社刊》第二十期,第1-5页。

[14]倓虚法师《影尘回忆录》第131页。

[15]以上均见倓虚法师《影尘回忆录》第55-68页。

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负责人读书班在京开班

本刊讯 11月9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负责人读书班开班仪式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培训中心养怡山庄举行。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一司司长徐远杰、培训中心副主任丛国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副会长戒忍法师、永信法师等领导出席开班仪式。

本次读书班为期6天。学员主要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未列入该名单但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汉传佛教寺院和中国佛教协会本部寺院的方丈或负责人,还特邀了几位佛教界的中青年学者。学员共计162人,年龄从30多岁到86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举办这样规模和层次的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负责人读书班。

开班仪式由徐远杰司长主持,丛国庆副主任致欢迎辞。随后,一诚长老和齐晓飞副局长作了重要讲话。

一诚会长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这期读书班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佛教界的关怀和对佛教工作的重视。希望大家藉此胜缘,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认识,以戒为师,勤修三学,肃正道风,提策正念,正信正行,做好各项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齐晓飞副局长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找到问题在哪里,才能加以解决。中国向来有“活到老、学到老”这样的传统。“活到老、学到老”的本质要求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相关的阐

述。就佛教界来说,成就与问题并存的现状也给我们提出了不断学习的要求。现在,佛教界获得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社会责任越来越大,但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怎样才能担负起责任,迎接新的挑战,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开班仪式结束后,徐远杰司长和学诚法师先后为读书班学员进行了第一天授课,题目分别为《顺应时代要求,促进社会和谐——关于我国佛教现状的报告》以及《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一些思考》。

这期读书班的整个日程安排比较充实。11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讲《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问题》,下午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讲宗教政策;12日上午由中央党校著名学者宫力教授讲《国际国内形势》,下午由国宗局政法司陈宗荣司长讲《宗教政策与法规》;13日上午由南京大学著名学者徐小跃教授讲《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午参观鸟巢体育馆、国家大剧院;14日上午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讲《佛教戒律与制度建设》。

14日13:10,160多位学员,分成五组,交流了几天来的学习心得。14:00,举行读书班的结业典礼,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徐远杰司长、王哲一副司长、刘威副司长,国宗局培训中心丛国庆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副会长永寿法师、觉醒法师,副秘书长蘧俊忠、陈文尧等参加了结业典礼。在结业仪式上,五个小组分别派一位代表,向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之后,学诚法师和徐远杰司长分别讲话;最后,各位领导向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

(常正)